

阿亚图拉卡沙尼与伊朗什叶派 政治运动的转型^{*}

李炫璇 韩志斌

摘要：近代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兴与变是理解 19—20 世纪伊朗政教关系的关键之匙，卡沙尼在运动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起承转合的角色。他积极从什叶派乌莱玛在烟草抗议运动和立宪革命的斗争中汲取经验，结合伊朗的历史实际，推动了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转型。立宪革命以降，伊朗的宪政因其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的宪政”，卡沙尼审时度势，他将具有现代政治色彩的“宪政话语”用于宗教学者领导的政治运动中，同时主张宗教学者在政治运动中与知识分子合作，这为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卡沙尼视野开阔，斗争手段多元，斗争路线与目标明确，其政治思想的有效性最终得到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检验。什叶派政治运动范式的革新为什叶派乌莱玛参政提供了理论保障，并最终赋予其发动革命，颠覆既有秩序的能力，从而为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扫清了障碍。

关键词：阿亚图拉卡沙尼 什叶派政治运动 乌莱玛 伊朗

作者：李炫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兴起是近代伊朗历史的独特现象，伊朗的历史交往过程中，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感。^①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震惊全球，并将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向了高潮，^②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背后，被誉为“霍梅尼直系先驱”^③ 的阿亚图拉卡沙尼（Ayatollah Kashani, 1882 – 1962 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发关注。20 世纪中期，卡沙尼大力复兴了沉寂已久的什叶派政治运动。他将伊朗的什叶派政治运动理解为“在宪政框架内的伊斯兰运动”，积极运用“宪政话语”，并重视与先前主导这一话语的现代知识分子合作，从而完成了伊斯兰革命前什叶派政治运动最重要的一次转型。

石油国有化运动是伊朗近代史的标志性事件，摩萨台（Mosaddeq）往往被视作运动的绝对领袖。^④ 相较而言，另一位运动领袖卡沙尼则长期受到忽视。事实上，卡沙尼的政治影响力并不亚于摩萨台，美国观察家称其为“石油国有化运动中的群众领袖”。^⑤ 尽管卡沙尼在“8·19 政变”后失势，但伊朗的什叶派政治运动已然在卡沙尼的实践创新中，具备了颠覆世俗政权的潜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项目号 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彭树智《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259 页。

②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50 页。

③ Ervand Abrahamian, *Khomeinism: Essay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04.

④ 代表性成果有：Ali Rahnama, *Behi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⑤ Cuyler Young, “The Social Support of Current Iranian Poli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 No. 2, 1952, p. 139.

力,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正是其逻辑结果。在此过程中,卡沙尼的理论与实践深刻影响了两代宗教领袖^①,其思想在当今伊朗的宗教政治体制中也可见端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前后,卡沙尼开始为学界所重视。法格福瑞最早注意到卡沙尼的政治角色,他揭示了什叶派乌莱玛政治行为的连续性。^②1979 年后,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和溯源伊斯兰革命,有关卡沙尼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③但基本将其限定在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框架内,^④部分成果强调卡沙尼在石油国有化运动中的负面作用。^⑤伊朗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有关卡沙尼的专著《民族之泪》^⑥与《阿亚图拉卡沙尼与石油国有化运动》^⑦利用相关的报刊、信件、演讲文本,还原了卡沙尼在石油国有化运动时期的政治参与。以什叶派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亦多强调卡沙尼的正面作用。^⑧此外,《阿亚图拉卡沙尼书信与演讲全集》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文本。^⑨国内学界尚无关于卡沙尼的研究成果,但部分研究从 19—20 世纪什叶派乌莱玛政治参与的角度梳理了近代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历史及其特征。^⑩本文尝试以卡沙尼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为出发点,系统总结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基本脉络与转型特征,揭示伊斯兰革命爆发的结构性因素。

一、阿亚图拉卡沙尼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践行

近代伊朗的历史命运与什叶派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恺加王权十分羸弱,伊朗人民反封建反帝的政治诉求往往只能借助宗教形式加以表达,什叶派政治运动由此而生。早在两次俄伊战争时期,乌苏勒派^⑪乌莱玛就借助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圣战法特瓦^⑫(*Fatwa*)支持伊朗的反帝爱国运动。20 世纪之交,什叶派政治运动已成为伊朗政治运动的主要形式。

卡沙尼自幼便意识到宗教学者参与政治的必要性,他见证了近代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兴

-
- ① 霍梅尼在石油国有化运动前后一直与卡沙尼保持联系,他常利用暑假拜访并跟随卡沙尼进行礼拜,参见:寰宇研究所学术办公室《民族之泪》(波斯语),德黑兰寰宇出版社,2013 年,第 186—189 页;哈梅内伊在其自传中三次提到卡沙尼,强调了卡沙尼对他人生的影响,参见[伊朗]阿里·哈梅内伊《化作红宝石的心血》,齐文东译,西南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16、60、64 页。
- ② Mohammad Hassan Faghfoory, *The Role of the Ulama in Twentieth Century Ira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Ayatullah Haj Sayyid Abul-Qasim Kashan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h. D. Dissertation, 1978, p. 6.
- ③ 代表性成果有: Yann Richard, "Ayatollah Kashani: Precurso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N. Keddie 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1—124.
- ④ Shahrouh Akhavi,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r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0.
- ⑤ Mark J. Gasiorowski, "The 1953 Coup D'état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9, No. 3, 1987, pp. 261—286; Ervand Abrahamian, "The 1953 Coup in Iran", *Science & Society*, Vol. 65, No. 2, 2001, pp. 182—215; Elton L. Daniel, *The History of Ira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
- ⑥ 寰宇研究所学术办公室《民族之泪》(波斯语),德黑兰寰宇出版社,2013 年。
- ⑦ 瓦希德·卡里加·贾姆胡里《阿亚图拉卡沙尼与石油国有化运动》(波斯语),德黑兰伊斯兰思想与文化研究出版社,2019 年。
- ⑧ 如穆罕默德·萨梅伊《伊朗的权力斗争》(波斯语),德黑兰内伊出版社,2022 年;赛义德贾拉勒丁·马达尼《近代伊朗政治史(第一卷)》(波斯语),库姆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哈米代·达尼什朱·哈迪·瓦基里《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中乌莱玛政治思想的起源》,《知识》(波斯语)2019 年第 6 期。
- ⑨ 穆罕默德·达汉维《阿亚图拉卡沙尼书信与演讲全集》(波斯语),德黑兰查帕赫什出版社,1982 年。
- ⑩ 李福泉、金鹏《什叶派乌里玛与 1905—1911 年伊朗立宪革命》,《安徽史学》2021 年第 3 期;蒋真《乌莱玛在伊朗立宪革命中的作用初探》,《史学集刊》2019 年第 2 期;刘中民《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伊斯兰教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伊朗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 年第 12 期。
- ⑪ 乌苏勒(*Usul*)意为原理。该派强调高级宗教学者“穆智台希德”的创制作用,与其相对的阿赫巴里派(*Akhbari*)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重要性。19 世纪以来,乌苏勒派乌莱玛成为伊朗什叶派的主流派别。
- ⑫ 又称宗教教令。法特瓦原指伊斯兰宗教学者对伊斯兰教法问题的权威裁决。乌苏勒派乌莱玛强调法特瓦只能由穆智台希德发布,后逐渐成为伊朗什叶派乌莱玛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

起。1892年，大阿亚图拉设拉子（Great Ayatollah Shirazi）发布宗教敕令^①，号召伊朗民众抵制国王纳赛尔丁（Naser al-Din）授予英国公司的烟草特许权。抗议运动最终以国王撤回非法的烟草特许权而告终，什叶派乌莱玛历史性地领导了伊朗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宪革命时期，戴缠头的宗教学者深度参与了立宪进程，1906年《基本法》及其补充条款^②的出台，标志着什叶派乌莱玛正式成为伊朗政治体制的合法力量，由他们领导的什叶派政治运动由此获得了伊朗的承认与保护。作为运动的亲历者，卡沙尼对宗教学者参与政治运动的构想与早期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基本价值取向密不可分。

首先，强烈的反殖民倾向是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首要特征。烟草抗议运动时期，具有反殖民色彩的“什叶派话语”深入人心，伊朗人民将其对殖民者的恐惧与宗教诉求、受损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③然而，一战后英国的殖民利益不降反升，英国人“近乎免费”地得到伊朗的石油补给。只要列强的殖民行动不中止，伊朗人民的反殖民诉求就会一直存在，具有反殖民内涵的“什叶派话语”与什叶派政治运动便会有十足的生命力。

其次，什叶派乌莱玛的群众路线是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鲜明特色。相比其他社会团体，乌莱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最了解伊朗人民的诉求。^④现代电报和印刷技术的普及进一步拉近了什叶派乌莱玛与信众的距离。1892年11月，住在萨马拉（Samarra）的设拉子开创性地通过电报将其教法意见传达给伊斯法罕与德黑兰的穆智台希德（Mujtahid），后者以设拉子的名义和波斯语的形式发布了法特瓦。^⑤巴扎商人（Bazaari）将法特瓦散布到伊朗社会各阶层，抗议遂演变成一场全民抵制烟草运动，^⑥法特瓦在伊朗社会运动中的政治合法性亦由此确立。^⑦此后，穆智台希德通过法特瓦动员群众成为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基本模式，群众的深度参与成为20世纪伊朗诸次社会危机的显著特征。

再者，伊朗早期的什叶派政治运动跨国色彩浓厚。阿塔巴特^⑧（Atabat）的什叶派乌莱玛通过跨国宗教网络，影响伊朗政治。什叶派独特的跨国宗教网络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18世纪以降，阿塔巴特接纳了大量有声望的什叶派乌莱玛，由此成为辐射多国的什叶派学术中心。立宪革命时期，若没有阿塔巴特乌莱玛的法特瓦，在伊朗支持宪法的人不会很多。^⑨诸如卡沙尼、霍梅尼等后来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骨干力量皆曾在此求学和避难，因此，跨国性是早期什叶派政治运动的重要特征，半个世纪后的伊斯兰革命仍具有跨国色彩。

最后，宪政体制是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根本保障。由于什叶派乌莱玛主导了立宪进程，他们最终作为一个获得宪法承认的特殊阶层正式进入了伊朗现代政治舞台，^⑩伊朗的宪政也由此成为“宗教的宪政”。尽管立宪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是其政治遗产“国民议会”（Majles）和“宪

① 该法特瓦内容为“奉普慈特慈真主之名。从今日起，任何形式的烟草消费都是对伊玛目的攻击，愿主加快隐遁伊玛目的降临！”参见：A. K. S. Lambton, “The Tobacco Regie: Prelude to Revolution I”, *Studia Islamica*, No. 22, 1965, p. 145.

② 1907年《基本法补充条例》第一条规定：伊斯兰教是伊朗的官方宗教，奉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Jafariya），国王必须信仰和宣扬该宗教。第二条规定：伊朗的所有法律必须得到什叶派宗教学者委员会的审核与批准，任何立法不得与伊斯兰原则相违背。

③ Nikki R. Keddie, *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Iran: The Iranian Tobacco Protest of 1891–1892*,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114.

④ Robert Graham, *Iran: The Illusion of Power*, London: Croom Helm, 1979, p. 218.

⑤ [美]阿巴斯·阿马纳特《伊朗五百年》，冀开运等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年，第313页。

⑥ 蒋真、郭欣如《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的嬗变》，《西亚非洲》2023年第1期，第94页。

⑦ Shahrough Akhavi,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r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0, p. 64.

⑧ 阿塔巴特原意为门槛，全称为阿塔巴特·阿里亚特（Atabat Aliyat），意为“神圣的门槛”。阿塔巴特今指伊拉克的四个什叶派圣城，即纳杰夫（Najaf）、卡尔巴拉（Karbala）、卡齐迈因（Kazamiyyeh）和萨马拉（Samarra），六代什叶派伊玛目的圣陵坐落于该地区。

⑨ 扎赫拉·阿西费《立宪革命运动中的纳杰夫乌莱玛》，《档案库》（波斯语）2006年第2期，第18页。

⑩ 李福泉、金鹏《什叶派乌里玛与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安徽史学》2021年第3期，第115页。

政/宪法”(Mashruteh)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成为了“什叶派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什叶派乌莱玛长期忽视“宪政话语”,但这无疑为卡沙尼的革新提供了参考。

尽管早期什叶派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但卡沙尼早年选择潜心学术。卡沙尼自幼移居纳杰夫,师从霍拉桑尼^①(Khorasani)等名师。他在 25 岁时便获得创制资格证书(Ijtihad),为其日后成为宗教运动的领导人奠定基础。一战爆发后,英国人的入侵迫使卡沙尼弃文从政,卡沙尼随其父积极参与“宗教圣战”,直至 1920 年被英军通缉后,卡沙尼才逃回伊朗。回到伊朗的卡沙尼继续开展政治活动,先是冀望恺加末代国王艾哈迈德沙(Ahmad Shah)扶大厦之将倾,后转向支持礼萨汗(Reza Khan)整肃秩序。此时的卡沙尼已然是教界在政坛的重要代表,1925 年底,卡沙尼以 21379 票入选第一届制宪会议(Majles Moasesan),他是德黑兰选区得票数第五的候选人^②,大会宣布礼萨汗为新任国王和巴列维王朝创始人。礼萨汗在登基后加紧围剿政坛的宗教学者,卡沙尼早期的政治活动也告一段落。

二、赓续传统:卡沙尼政治践行中的传统要素

二战前,卡沙尼的政治行为中包含了大量早期什叶派政治运动的要素,构成了其政治观的底色。二战后,卡沙尼继续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其领导的宗教政治运动中。

(一) 以伊斯兰国际主义原则为基本指导思想

卡沙尼是什叶派跨国宗教网络的产物,他承继和发扬了阿塔巴特乌莱玛的国际主义精神,主张跨越国界与派别的伊斯兰世界大团结。长期以来,阿塔巴特是什叶派世界的学术中心,这里的学者天生具有更广阔的视野。^③一方面,他们关心伊朗和其他国家什叶派穆斯林的福祉;另一方面,一战的爆发消弭了伊拉克各派穆斯林之间的隔阂,“在殖民者面前,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差异不再重要,超越党派的团结是(伊拉克反英)起义中最开明进步的特征”。^④这种超越派别与国别的伊斯兰国际主义思想在后来成为卡沙尼政治行为的重要原则。此外,卡沙尼的伊斯兰国际主义思想中还包含其将伊斯兰国家问题国际化的逻辑考量。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应运而生,卡沙尼一直将其视为解决伊斯兰国家问题的重要手段。卡沙尼将其伊斯兰国际主义精神中的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服务于他的宗教政治事业。

二战后,卡沙尼政治行为充分诠释了伊斯兰国际主义精神,他是最早揭露以色列侵略行径与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公众人物之一。早在 1947 年,卡沙尼就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彼时他刚刑满释放。在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第 181 号决议》后,卡沙尼发表声明谴责联合国决议,“犹太人杀害你们、摧毁你们家园与生活、驱赶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⑤卡沙尼积极声援巴勒斯坦穆斯林,“全世界穆斯林应该尽全力阻止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迫行径,减轻巴勒斯坦穆斯林的苦难”。^⑥卡沙尼关于伊斯兰国际主义的言论得到了伊斯兰敢死队^⑦(Feda iyan

① 霍拉桑尼是什叶派最有影响力的效仿源泉(1895-1911 年)之一。霍拉桑尼师从大阿亚图拉设拉子,长期在纳杰夫讲学,是伊朗立宪革命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其弟子包括大阿亚图拉伊斯法哈尼。

② 穆斯利·塔赫瓦利《阿亚图拉卡沙尼传》(波斯语),库姆书香花园出版社,2007 年,第 17 页。

③ Mohammad Samiei, “Najaf and Iranian Politics: Analysing the Way the Hawzah of Najaf Influenced Iranian Politics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Journal of Shia Islamic Studies*, Vol. 5, No. 3, 2012, p. 289.

④ Yann Richard, “Ayatollah Kashani: Precurso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N. Keddie 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06.

⑤ 寰宇研究所学术办公室《民族之泪》(波斯语),德黑兰寰宇出版社,2013 年,第 61-62 页。

⑥ 赛义德贾拉勒丁·马达尼《近代伊朗政治史(第一卷)》(波斯语),库姆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72 页。

⑦ 伊斯兰敢死队是成立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强调伊斯兰世界大团结,反对宗派主义。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通往真理之路》(Rahnama-ye Haqayeq)一书中。

Islam) 的支持,后者在其党报《伊斯兰之旗》(Parcham-e Islam) 上大力宣传卡沙尼的言论。卡沙尼同样关心其他国家穆斯林的福祉,1956年,他积极声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化。1958年,他曾致信联合国,要求其调停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的争端。此外,卡沙尼多次将伊朗内部问题国际化,获得国际社会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卡沙尼开阔的斗争视野为其政治斗争开辟了新的道路。卡沙尼政治斗争中的国际主义因素形成于卡沙尼的求学时代,是其“纳杰夫印记”的突出表现,后来为霍梅尼所继承。

(二) 以反对英帝国主义为首要斗争目标

与卡沙尼同时代的美国人称其“一生都在反抗英国人”,^①霍梅尼认为他是“(伊朗)唯一一个始终站在抗英运动前线的人”。^②卡沙尼先后三次^③组织和领导抗英圣战运动,两次被英国殖民者通缉与监禁,他曾言“如果我被释放,我保证这个国家不会给英国佬一滴石油”。^④此外,卡沙尼的父亲亦死于英国人之手,因而英国殖民者对他而言,既是“国仇”,也是“家恨”。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贯穿卡沙尼的一生,卡沙尼在幼年时见证了英国人擄掠伊朗烟草专卖权的卑劣行径,在青年时又目睹英国剿灭伊朗民主革命并公然入侵伊拉克。1921年苏联与伊朗签订合约后,英国殖民利益成为伊朗朝野斗争的唯一对象,伊朗人对英国人极度愤恨与恐惧的情绪映射在其社会观念中,“在20世纪,无论多么微小的事件,伊朗人都相信是英国的幕后黑手在策划与操纵”。^⑤二战后,反英情绪持续发酵,该时期伊朗的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复兴皆是反英情绪的产物,“很多伊朗人无法想象英国人没有参与阴谋,奇怪的是他们需要(利用)阴谋”。^⑥石油国有化运动后,英国在伊朗的商业特权最终被废止,但英国业已持续百年的殖民统治完全覆盖了卡沙尼70余年的成长和从政时代。

卡沙尼的抗英实践集中体现在石油国有化运动时期,这为“世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留下了伊斯兰教的印记。二战后,反抗英国在伊朗石油特权的活动中最有可能演化为全国性政治运动,卡沙尼是伊朗较早洞见这个问题并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的关键人物。早在1949年初,卡沙尼就意识到组织一场反英爱国运动的必要性,他有关反对英国及其傀儡政府的演讲,惊动了沙阿。彼时恰逢巴列维国王遇刺,当局最终将卡沙尼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然而,半年后臭名昭著的英伊《加斯—古丽沙延》(Peyman Gass-Golshayan)石油协议补充条款签署时,流亡者卡沙尼的诉求得到了朝野内外的响应。伊朗民族主义者马基(Makki)在议会鼓动称“卡沙尼是因为支持伊朗石油国有化而被流放的”。^⑦而后卡沙尼与国民阵线(Jebhe Melli Iran)的骨干入选第十六届议会,他们共同发起了反英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总而言之,卡沙尼是20世纪的40年间唯一一个始终站在反英殖民斗争最前线的宗教学者,正是其光辉的反英履历将其推上了政治生涯的高峰。在卡沙尼反英帝国主义实践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乌莱玛从民族主义与政治,而非宗教学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石油国有化问题。^⑧拉兹马拉遇刺后,更多的穆智台希德发布法特瓦,要求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⑨

① Cuyler Young, “The Social Support of Current Iranian Poli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 No. 2, 1952, p. 139.

② 穆罕默德·拉贾比《伊玛目霍梅尼传》(波斯语),德黑兰伊斯兰革命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③ 分别是1914—1921年、1941—1943年、1946—1953年。

④ 赛义德贾拉勒丁·马达尼《近代伊朗政治史(第一卷)》(波斯语),库姆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88页。

⑤ Homa Katouzian, *The Persians: Ancient, Mediaeval and Modern Ir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5.

⑥ Ali M. Ansari, *Modern Iran since 1797: Refor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214.

⑦ 侯赛因·马基《石油与马基的演讲》(波斯语),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出版社,1979年,第395页。

⑧ 穆尔克·塔基·胡斯拉维、扎赫拉·马苏德《评估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中宗教学者的角色》,《国际关系研究季刊》(波斯语)2012年第1期,第109页。

⑨ 同上,第107页。

(三) 以巴扎商人为中介, 密切联系群众

巴扎商人和乌莱玛的政治经济联盟是伊朗近现代史上重大政治运动的核心推动力,^① 他们在宗教意识形态、反现代化经济、反殖民等重要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卡沙尼在群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行会和巴扎商人中。^② 卡沙尼曾与多个社会组织和巴扎商人代表关系紧密, 回国后, 卡沙尼同德黑兰巴扎商人建立了政治联系, 成为德黑兰巴扎的利益代言人。1923 年, 穆斯托菲内阁因党派倾轧而倒阁。德黑兰巴扎商人要求卡沙尼进行挽留, 后者陪同德黑兰巴扎代表克尔曼尼劝见沙阿阻止内阁倒台。^③ 此后, 卡沙尼与另一位巴扎商人代表哈伊利扎代 (Haerizadeh) 在反共和运动中通力合作。卡沙尼和巴扎商人的准联盟关系是其政治活动的基本盘。二战结束后, 卡沙尼继续在巴扎商人的支持下, 多次在议会胜选。

卡沙尼借助德黑兰巴扎势力, 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政治联系。卡沙尼认为“乌莱玛的生计与人民有关, 因而他们应当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表面上是人民群众效仿宗教学者, 但归根结底 (应该是) 宗教学者顺应民意, 伊斯兰教是政治宗教”。^④ 原本石油国有化的口号只在少数政治精英中流行, 而卡沙尼真正将它带到人民面前并使它深入人心。^⑤ 密切联系群众赋予卡沙尼强大群众动员能力, 伊朗上校哈桑·阿尔法 (Hassan Arfa) 认为卡沙尼“可以轻松组织一场万人规模的集会, 而摩萨台组织的集会到场者不过千余人”。^⑥ 巴扎和清真寺用同质的宗教伦理和生活方式将城市的所有人群联系起来, 巴扎里面的清真寺、宗教学校及其纵横交错的小道为群众的集会提供了公共空间, 没有巴扎的城市是难以想象的。^⑦ 巴列维王朝时期, 现代化进程势如破竹地摧毁着以巴扎为代表的传统生活, 这将对现代化不满的传统阶级与市民再次推向巴扎内部, 他们在伊斯兰教旗帜的号召下发起政治抗争。

卡沙尼与德黑兰巴扎势力的合作在石油国有化运动达到顶峰。卡沙尼将其宗教和政治合法性与巴扎商人的财力和暴力巧妙结合在一起, 强力干预了石油国有化运动进程。卡沙尼与克尔曼尼等巴扎代表私交甚好, 并通过穆斯林圣战者组织 (Mujahdin Muslim) 来巩固与巴扎的合作。穆斯林圣战者组织由卡沙尼及其家人、三位德黑兰巴扎商人代表领导, 成员主要由行会长老、学徒以及中小商人等人群组成。^⑧ 卡沙尼与巴扎上层势力的合作从经济上支持了他的政治活动; 巴扎中下层青年作为伊朗最同质化的社会群体之一, 在伊朗的暴力抗争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⑨ 卡沙尼和伊斯兰敢死队的非正式关系是其发动罢市和游行集会的重要资本, 该组织以暗杀知名人士而闻名, 刺杀拉兹马拉的行动正是基于这种合作的产物。借助巴扎商人与人民群众的支持, 卡沙尼最终将巴扎群体在社会抗争中的作用最大化。

综上所述, 卡沙尼政治斗争的视角、目标和路径皆具有显著的传统特征, 这些传统要素是身为宗教学者的卡沙尼开展政治斗争的底色, 为其创新提供了必要基础。

① Ahmad Ashraf, “Bazaar-Mosque Alliance: The Social Basis of Revolts and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 No. 4, 1988, p. 539.

② 穆罕默德·萨梅伊 《伊朗的权力斗争》(波斯语), 德黑兰内伊出版社, 2022 年, 第 419 页。

③ 穆斯利·塔赫瓦利 《阿亚图拉卡沙尼传》(波斯语), 库姆书香花园出版社, 2007 年, 第 17 页。

④ 侯赛因·马基 《伊朗历史二十年: 1941 年 8 月后》(波斯语), 德黑兰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第 93 页。

⑤ 穆尔克·塔基·胡斯拉维、扎赫拉·马苏德 《评估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中宗教学者的角色》, 《国际关系研究季刊》(波斯语) 2012 年第 1 期, 第 109 页。

⑥ General Hassan Arfa, *Under Five Shah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1965, p. 392.

⑦ Armin Mehdipour and Hoda Rashidi Nia, “Persian Bazaar and its Impact on Evolution of Historic Urban Cores: The Case of Isfahan,” *The Macrotheme Review*, Vol. 2, No. 5, 2013, p. 13.

⑧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58.

⑨ Mehdi Mozaffari, “Why the Bazaar Rebel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8, No. 4, 1991, p. 377.

三、革故鼎新：卡沙尼政治行为中的创新要素

二战前后，伊朗的什叶派政治运动持续陷入低潮，卡沙尼审时度势，将前序斗争的政治遗产与伊朗突变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了什叶派政治运动的根本变革。

1921年，什叶派乌莱玛一度成为议会的中流砥柱，宗教学者莫达莱斯^①（Modarres）控制了第四届议会选举。^② 据称，礼萨汗曾派人送他十万土曼，劝说其不要涉足政治，莫达莱斯拒绝了这笔巨款，并表示“宗教和政治在伊斯兰教中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像基督教一样是仪式性的”。^③ 1928年莫达莱斯被流放后，什叶派乌莱玛在议会节节败退，“在第六届议会中，约40%成员以宗教学者身份出现，第七届议会下降至30%，其中6人是被政府事先承认，戴着缠头的毛拉……在1935年9月召开的第十一届议会选举中，一个醒目的宗教学者都找不到了”。^④ 礼萨汗执政的后期，任何以宗教形式为载体的社会表达与政治行为皆遭到禁止，致使早期的宗教政治运动深陷困境，宗教政治运动事实上的合法性已然不再。

二战后，巴列维国王延续了礼萨汗的宗教政策，对卡沙尼的迫害尤甚。1949年2月，卡沙尼受“巴列维刺杀案”牵连被捕，后被流放到黎巴嫩。巴列维国王随即示意“政治静默主义”派宗教学者布鲁吉尔迪（Grand Ayatollah Borujerdi）^⑤ 在库姆召开宗教大会，阻止乌莱玛干政。伊朗全国约2000名宗教学者参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反对“政治行动主义”的决议，呼吁宗教学者不要参与政治。^⑥ 至此，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迎来至暗时刻。

尽管什叶派政治运动深陷困境，但是卡沙尼始终在坚持复兴什叶派政治运动。二战后，他不顾巴列维国王的文攻武赫，成功领导了战后初期伊朗的什叶派政治运动。1950年，卡沙尼顺利入选第十六届议会，而后立刻投身到石油国有化运动中。卡沙尼重返议会标志着什叶派乌莱玛的政治行动再次获得合法性，也意味着议会内部再次出现了主张参政的宗教人士，伊朗的政治社会运动再次有了强烈的宗教元素。在运动期间，卡沙尼遵循宪政精神，创造性地使用大量“宪政话语”，重视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与合作，在多个场合展开宗教论战与斗争，他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他对传统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兼收并蓄和伊朗历史现实的深刻认识。

（一）强调使用“宪政话语”，拉进与世俗知识分子的距离

使用宪政话语与接触新式知识分子^⑦是卡沙尼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必须从整体加以理解。卡沙尼的宪政观并不是对“宪政话语”的机械运用和生搬硬套，具体有三层含义：第一，卡沙尼是最早意识到“宪政话语”对复兴什叶派政治运动重大意义的宗教学者；第二，卡沙尼强调严格遵循“宪政话语”开展政治斗争；第三，卡沙尼是第一个以“宪政话语”为基础，为什叶派政治运动提出可行方案并加以实践的宗教学者。

① 哈桑·莫达莱斯是立宪革命后最早参与议会政治的宗教学者。他的殉道日后被定为议会日（波斯历阿扎尔月的第十日）。在伊朗宪政博物馆中，莫达莱斯与卡沙尼的画像一同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

② Amin Banani, *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 1921 - 194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41.

③ 古拉姆阿里·拉贾比《孤身在祭坛》（波斯语），库姆沙希德卡齐米出版社，2021年，第85页。

④ Mohammad H. Faghfoory,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on the Ulama in Iran, 1925 - 1941", *Iranian Studies*, Vol. 26, No. 3/4, 1993, p. 286.

⑤ 大阿亚图拉布鲁吉尔迪是20世纪中期伊朗最有影响力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布鲁吉尔迪在大阿亚图拉伊斯法哈尼（Grand Ayatollah Isfahani）去世后成为什叶派唯一的效仿源泉（*Marja' Taghlid*）。

⑥ 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⑦ 知识分子本是对一个社会有学问者的总称。但在波斯语语境中，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学者名曰“乌莱玛”或教士（*Ruhaniyan*），而接受世俗教育的学者曰“知识分子”（*Roshanfekr*，直译为启蒙思想者），伊朗学界亦倾向于乌莱玛与知识分子的两分法，可见伊朗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存在先入为主的思维，将其视为现代、宪政、民主等近代舶来品的同义词。

首先，卡沙尼始终强调宗教学者应在宪政框架下参与政治运动。“当宪政的种子播下时，再想铲除革命果实就不可能了”。^① 在卡沙尼复兴“宪政话语”之前，什叶派乌莱玛长期在宪政与舆论领域处于守势，这是因为立宪革命带来了关于“现代”与“传统”的争论。知识分子作为立宪革命的另一倡导者，被视作是“现代的”和“进步的”。由于革命前，伊朗不存在西方世界所谓“民族”的概念，^② 作为现代民族主义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将伊斯兰教视作伊朗遭受侵略和落后的原因。什叶派乌莱玛因其宗教属性被视作“传统的”和“落后保守的”，他们拒绝或被迫接受宪政、进步（*Taraqi*）、民主（*Demukrasi*）、现代性（*Tajadod*）等概念^③。卡沙尼不同于同时代的大多数宗教学者，他将在历史上与宗教相连的“宪政话语”视作重要法宝，并再次将其融入宗教政治的话语体系。早在 1928 年礼萨汗加紧打击宗教学者时，卡沙尼就意识到“宪政话语”的潜在价值，他在致哈吉·赞贾尼的信中坦言，“你应当知道（当前乌莱玛困境）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进行议会改革”。^④ 此外，礼萨汗的现代化改革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伊朗的什叶派话语与传统，“它们只是被忽视了”。^⑤ 二战后，卡沙尼在与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打破后者对“宪政话语”的垄断，这为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卡沙尼的政治行动严格遵循“宪政话语”与宪政精神，这是他一生政治实践最鲜明的特征。20 世纪伊朗的历史已经证明，蔑视、无视或是无法维护宪法的人，皆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窃取伊朗宪政运动果实的英国殖民者成为伊朗人民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对象，无力维护宪政的恺加在制宪会议寿终正寝，无视宪政谋求“独裁领导权”的摩萨台被盟友抛弃，巴列维国王终因“放弃了波斯的宪政遗产”^⑥ 而被推翻。1953 年政变标志着宪政作为一种可行政治话语与实践的终结，^⑦ 霍梅尼重拾宪政遗产，最终“合法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卡沙尼严格遵循“宪政话语”的实践可从两个层面解读：第一，重视 1906 年《基本法》及其补充条款；第二，重视《联合国宪章》。1949 年，巴列维国王曾想修改《基本法》强化自身权力，卡沙尼用典型的“宪政话语”怒斥其行为非法，“伊朗人民最大的成就是宪法，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来捍卫这部用鲜血制成的宪法，我要求议员们与人民一同走向自由与宪政之路。”^⑧ 在石油国有化运动期间，卡沙尼强调“根据尊重国家主权的《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不得干涉他国内政，阻止其行使主权，伊朗人将基于这一原则，从外国人手夺回自己的权利，通过投票将全国石油国有化”。^⑨ 从上不难看出，卡沙尼在重视《古兰经》和圣训的同时，还深谙伊朗宪法与《国际法》，用西方人熟悉的话语武装自己领导的宗教政治运动。

最后，卡沙尼基于“宪政话语”，与知识分子对话合作，为什叶派政治运动的转型开辟了道路。在礼萨汗时代，乌莱玛被贴上落后反动的标签，他们在礼萨汗的暴政下厌恶政治。^⑩ 以哈里（Haeri）与布鲁吉尔迪为首的宗教学者选择消极回避这一问题，致使什叶派乌莱玛在与知识分子的论战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二战后，新式知识分子政治影响力渐长，以摩萨台为首的新派

① 赛义德·马赫穆德·卡沙尼《阿亚图拉卡沙尼：从伊拉克到伊朗》，《目击者之友》（波斯语）2007 年第 2 期，第 35—36 页。

② Homa Katouzian, *The Persians: Ancient, Mediaeval and Modern Ir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4.

③ Behrooz Moazami, *State,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Ir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80.

④ Yann Richard, “Ayatollah Kashani: Precurso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N. Keddie 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07.

⑤ Amin Banani, *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 1921–194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6–77.

⑥ Ali M. Ansari, *Modern Iran since 1797: Refor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406.

⑦ Behrooz Moazami, *State,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Ir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49–50.

⑧ 穆罕默德·达汉维《阿亚图拉卡沙尼书信与演讲全集》（波斯语），德黑兰查帕赫什出版社，1982 年，第 73 页；加赞法尔·鲁克阿巴迪《政治、宗教与阿亚图拉卡沙尼》（波斯语），德黑兰近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2000 年，第 147 页。

⑨ 赛义德贾拉勒丁·马达尼《近代伊朗政治史（第一卷）》（波斯语），库姆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85 页。

⑩ Mohammad H. Faghfoory, “The Ulama-State Relations in Iran: 1921–194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9, No. 4, 1987, p. 427.

知识分子第一次领导社会政治运动，^①填补了战前什叶派乌莱玛在政治领域的真空。什叶派乌莱玛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与伊朗世俗知识分子的关系，二是如何面对世俗宪政体制对什叶派乌莱玛权力的解构。此外，伊朗世俗知识分子与宗教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缺乏直接的沟通渠道。表面上看，这两个异质团体不用彼此支持，也可以成为伊朗政治的强大势力，但20世纪伊朗的历次政治运动如立宪革命、石油国有化运动与伊斯兰革命，皆证明了两者的必要性，他们共同构成了伊斯兰革命的主力军。^②库勒·杨敏锐地指出伊朗社会撕裂的现象，并强调宗教学者与知识分子合作的必要性，“伊朗的传统知识分子（宗教学者）和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世俗知识分子）缺乏互信与合作，这是现代伊朗的一大悲剧……在伊朗人有机会解决西化问题前，两者的分裂必须先得到弥合”。^③卡沙尼最早意识到与知识分子合作的必要性，他使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宪政话语”，促成了两个群体历史性的合作。他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解决了这两个根本性难题，克服了什叶派乌莱玛在伊朗政治领域的劣势，重新定义了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前进方向。

1950年，摩萨台曾照会首相曼苏尔，要求后者允许卡沙尼回国。卡沙尼在结束流放后，在宪政框架内追随国民阵线发起石油国有化运动。卡沙尼深知彼时宗教学者的政治优越地位丧失殆尽，什叶派政治运动复兴的第一步是与如日中天的知识分子和解。然而，在运动过程中，卡沙尼不是一味被动地迎合知识分子，他意识到摩萨台渴求乌莱玛的宗教合法性与群众基础。在合作过程中，卡沙尼叩开了更大的政治之门，他与知识分子分享宪政红利，并在运动后期占据了舆论制高点。

卡沙尼于1952年8月7日当选第十七届议会议长，这是其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尽管他作为“虚位议长”将其职能委任给副手，并在次日宣布将全权交给摩萨台，^④但宗教学者再次担任议长仍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1953年，在摩萨台要求延长“紧急权力”时，卡沙尼发布了抵制摩萨台的法特瓦，并称其为“自由终结者”。^⑤以卡沙尼和巴卡伊（Baqai）为首的反对派巧妙地将首相与国王的关系描绘成敌对关系，认为摩萨台意想推翻宪政君主（立宪）体制。^⑥彼时，伊朗社会并不存在摩萨台设想的用议会民主制推翻君主立宪制的条件，“除了极端的左派和右派，国王仍是大多数伊朗人公认的忠诚对象”。^⑦摩萨台就此失去了伊朗宪政赋予其的合法性。“拉兹马拉遇刺案”同样体现了卡沙尼对宪政原则的坚守。卡沙尼成为议长后，坚称根据宪法赦免了刺客塔赫马斯比。尽管这次行动颇具争议，但从中不难看出，卡沙尼的斗争行动均严格遵守既有的宪政规则，与“违宪”的行为势不两立。

在宪政框架内参政赋予卡沙尼政治合法性。当伊朗国王、首相或者其他团体试图僭越宪法时，卡沙尼便可轻而易举地站上道德的制高点。由于伊朗社会其他阶级都缺乏与群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宪政话语”赋予卡沙尼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更重要的是，卡沙尼的实践预示着宗教学者在与世俗知识分子的政治博弈中已经不再处于下峰。一旦掌握了现代政治的密码，拥有群众基础和独立财源的乌莱玛便有可能在伊朗的政治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卡沙尼的实践证明了

① Ahmad Ashraf, "Bazaar-Mosque Alliance: The Social Basis of Revolts and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 No. 4, 1988, p. 560.

② 王泽壮《从“理论批判”到“武器批判”——论伊朗“8·19”政变和“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第11页。

③ Cuyler Young, "The Problem of Westernization in Modern Ira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2, No. 1, 1948, p. 59.

④ Yann Richard, "Ayatollah Kashani: Precurso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N. Keddie 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2.

⑤ [美]阿巴斯·阿马纳特《伊朗五百年》，冀开运等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年，第572页。

⑥ Ali Rahnama, *Behi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61.

⑦ Cuyler Young, "The Social Support of Current Iranian Poli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 No. 2, 1952, p. 142.

乌莱玛在政治运动中与世俗知识分子合作的必要性，而后霍梅尼非常重视与阿里·沙里亚提 (Ali Shariati) 等世俗知识分子的往来。换言之，卡沙尼时期的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在传统特征的基础上，第一次被赋予了能够对王权构成威胁的核心竞争力。

(二) 综合运用多种途径领导政治运动

卡沙尼政治行为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斗争手段极其多元。鉴于卡沙尼与伊朗社会各界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联系，他有能力通过多个途径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些手段兼具国际视野、现代政治要素、群众观与革命斗争观，实现了对过往宗教学者单一斗争手段策略的超越。不同的斗争方式间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构成卡沙尼领导群众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

首先，除了在议会战线进行政治活动外，卡沙尼频繁地在各大媒体、报刊上发表宣言和声明，号召和组织巴扎商人、群众罢市和集会。《目击者》报 (Shahed) 和《信息》报 (Ettela'at) 是卡沙尼发动舆论的主要阵地，其中《目击者》报是劳动党 (Hezb-e Zahmatkeshan) 党报，主要服务对象是巴扎商人。1950 年 12 月 21 日，卡沙尼在《信息》报呼吁群众于次日 (聚礼日) 在沙阿清真寺集会，支持石油国有化。12 月 29 日，卡沙尼在巴哈雷斯坦广场 (Meydan - e Baharestan)^① 组织了另一场游行示威。次日，卡沙尼在《目击者》报发布宣言，鼓励“所有虔诚的穆斯林和爱国者加入国有化运动斗争来对抗伊朗和伊斯兰的敌人”。卡沙尼的活动不仅局限在德黑兰，卡沙尼还在加兹温巴扎上发表宣言，要求加兹温人民参与石油国有化斗争。卡沙尼在 1950 至 1953 年的数次声明和集会将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擢升到新的高度。^②

卡沙尼在石油国有化运动的另一个关键时刻“4·30 起义”^③ 中同样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1952 年 7 月中旬，摩萨台宣布辞职。7 月 17 日，老臣卡瓦姆 (Qavam) 再次上任，这引起了国民阵线的不满。当日卡沙尼宣布反对新政府并组织巴扎商人罢市，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7 月 19 日，卡沙尼在《目击者》报上谴责卡瓦姆是“宗教、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敌人”。7 月 21 日，伊朗爆发全国性起义，议会广场和的德黑兰巴扎成为冲突最为血腥的地方。^④ 面对舆论压力，时年 77 岁的卡瓦姆请辞，摩萨台再次出山。当晚，卡沙尼在《今日西方》报 (Bakhtar Emroz) 发表声明，在表达对烈士 (Shahid) 家属的慰问后，他要求人们停止罢工，摩萨台得以在短时间内重振旗鼓。卡沙尼的社论对于“4·30 起义”不可或缺，他的领导与动员证明了该模式的有效性，起义表明城市中下层可以成为与政治精英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此外，卡沙尼还在《寰宇》(Keyhan)、《星火》(Atash) 报上发表社论，领导石油国有化运动。卡沙尼也积极接受挪威、埃及等外国媒体采访，这提升了他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卡沙尼凭借其在议会的合法地位，多次向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和团体致信表达合法诉求。这些书信部分改善了他的处境，且具有警示作用。从内容上看，信件内容围绕着反英殖民和维护宪政等重要方面。卡沙尼曾数次致信联合国，将其政治诉求正当化与国际化。卡沙尼曾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怒斥以色列，“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们都在期待着你们 (联合国) 的裁决，制止以色列的侵略行径”。^⑤ 此后，卡沙尼在 1954 年致信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Hammarskjöld) 并控诉首相扎赫迪“正在践踏伊朗的宪法、《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⑥ 1958 年，卡沙尼再次致信联合国，要求其调停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的争端。卡沙尼致信联合国的经历充分体现了

① 即议会广场。巴哈雷斯坦广场是伊朗议会的所在地，也是近代伊朗人民政治集会的主要地点。

② 穆斯利·塔赫瓦利 《阿亚图拉卡沙尼传》(波斯语)，库姆书香花园出版社，2007 年，第 50 页。

③ “4·30” 起义 (Ghiat Siam-e Tir) 指波斯历 1333 年 4 月 30 日 (1952 年 7 月 21 日) 的起义。

④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72.

⑤ 赛义德贾拉勒丁·马达尼 《近代伊朗政治史 (第一卷)》(波斯语)，库姆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72 页。

⑥ Yann Richard, “Ayatollah Kashani: Precurso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N. Keddie 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8.

其独到的政治敏锐性和国际视野。

卡沙尼也多次向议会致信。尚在流亡的卡沙尼曾就《加斯—古丽沙延》(Peyman Gass-Golshayan)石油协议补充条款问题致函国民议会,“石油属于伊朗民族,以武力和不情愿签订的合同没有法律价值。”1950年6月,卡沙尼再次致函议会,抗议流放并辩称“一个为宪法流血的民族将永远不再成为独裁者和暴君的牺牲品。”一个星期后,卡沙尼得以回到伊朗,策划石油国有化运动。在卡沙尼和摩萨台的书信往来中,“8·19政变”前的卡信件最为重要。“4·30起义”以来,摩萨台的“紧急权力”不断被延长,这种特殊状态的常态化违背了宪政原则。卡沙尼信中警告摩萨台,“你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坚决不执行公投,还关闭了议会”。除此之外,卡沙尼与国王、历任首相都有大量书信往来,向知名人士与机构致信作为卡沙尼政治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卡沙尼借助宗教法特瓦,将大量极具象征意义的经文传达给追随者,他的法特瓦在多个关键时间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0年7月,卡沙尼在德黑兰巴扎演讲呼吁罢市,发布与石油国有化的法特瓦,“你们(议员)可以杀了我们,但却不能把我们的石油给外国人”。^①与此同时,卡沙尼号召群众向拉兹马拉政府施压,阻止其卖国行动,这个宣言被视为反对与刺杀“卖国贼”拉兹马拉的法特瓦,从而赋予了刺杀拉兹马拉行动宗教合法性。1951年9月,英国政府下令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卡沙尼发布法特瓦,以宗教的名义号召社会各界进行“金融圣战”,他援引《古兰经》经文,“谁将善债借给真主,真主将加倍偿还,他会受到丰厚的报酬”(57:11),并要求伊朗人将其在沙汗沙银行(英国控股)的存款转移到伊朗银行,以促进反帝反殖运动的开展。^②此举缓解了摩萨台政府中期的财政危机。在摩萨台辞职的一个星期内,卡沙尼再次发布法特瓦,要求信徒为保卫民族利益不惜对抗军队。很多宗教学者响应卡沙尼的号召,陆续发布法特瓦以示支持,1951年2月,阿亚图拉洪萨里(Ayatollah Khansari)发布法特瓦,认定“支持石油国有化运动”是一项宗教义务。^③

四、结语

石油国有化运动时期,以卡沙尼为首的“政治行动主义”派乌莱玛,将什叶派政治运动再次推向高潮,其宗教政治斗争主要有四个特征:强调使用法特瓦等具有宗教象征的手段;和平情愿为主,辅以暴力反抗;经济斗争与政治抗争并重;既强调面向议会和宪政,也强调面向巴扎和群众。这些特征赋予其行动道义和政治合法性、宗教合规性与经济合理性。

卡沙尼在其跨度逾40年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地接续传统,革故鼎新,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新范式最终确立。1953年后,经过理论革新与实践的什叶派政治运动已然具备颠覆伊朗既有政治秩序的潜力。1963年以来霍梅尼领导的宗教政治运动延续了卡沙尼时代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基本路径,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正是卡沙尼对宗教政治思想加以创新的逻辑结果。卡沙尼在二战后的政治行为是理解伊斯兰革命的一把钥匙,不理解卡沙尼的政治行为,就无法理解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卡沙尼解决了伊朗早期什叶派政治运动与乌莱玛所面临的一系列理论难题,例如什叶派乌莱玛如何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面对后者的舆论攻势?受宪法承认的宗教学者如何有效使用

① 瓦希德·卡里加·贾姆胡里 《阿亚图拉卡沙尼与石油国有化运动》(波斯语),德黑兰伊斯兰思想与文化研究出版社,2019年,第134页。

② 阿里·达赫瓦尼 《伊朗宗教学者的运动(第一卷)》(波斯语),德黑兰伊玛目礼萨文化基金会,1981年,第238页。

③ 彭树智编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07页。

“宪政话语”？如何处理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卡沙尼巧妙地处理了上述几对矛盾，他重视“宪政话语”，强调宗教学者与知识分子的接触与合作；他既从什叶派传统中汲取经验，也深谙现代政治的运转逻辑；他在满足伊朗民族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适度支持全球伊斯兰的大团结，在有限的条件下调和了伊斯兰信仰与爱国主义的模糊关系。^①事实上，尽管卡沙尼主张宗教学者参与政治事务，但是他主张较为温和，他并不寻求建立伊斯兰政府，^②而更加趋向于宗教学者监督君主模式，他也在政治上与奉伊斯兰极端思想为主宰的组织划清界限。卡沙尼政治思想中乌莱玛督政的形式实为后来霍梅尼在 1970 年时所畅想“教法学家监护”（*Vilayat-e Faqih*）体制^③的原型，当下的“教法学家治国”实践与伊斯兰共和思想，实为后来伊斯兰革命时，霍梅尼思想发生左倾的结果。^④

卡沙尼的政治行为亦显示出其时代局限性。学界和社会对卡沙尼的批评多在于他在收受美国贿赂^⑤后，倒向保王阵营，进而导致了石油国有化运动的破产。此外，在一个盛行“忠君”思想的社会里，他的思维无法突破立宪革命以来君主立宪制的束缚。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这种缺陷是可以理解的，这正是卡沙尼交给其继承者霍梅尼的时代命题。

近代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发展逾 100 年，滥觞于烟草抗议运动时期，发展于立宪革命时期，成熟于石油国有化运动时期，并在伊斯兰革命时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以卡沙尼与石油国有化运动为参照，卡沙尼起承转合的历史作用就更加突出。他的实践兼具创新性、时代性、典型性与本土性，赋予了什叶派政治运动一系列现代政治的表征。卡沙尼给同时代的伊朗人两点启示：第一，宗教学者有能力组织动员社会各阶级群众发起一场政治运动；第二，宗教学者可以运用“宪政话语”在现代知识分子间进行论战，且可以让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革命队伍。这样的信念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处于巴列维独裁暴政时代的伊朗人而言，极具吸引力与煽动性。卡沙尼的宗教政治信条兼容了近代伊朗政治的“传统”与“现代”因素，体现出伊朗历史的“双重属性”，他既能在什叶派运动中拉拢知识分子，也能在伊朗世俗政治进程中刻下宗教的印记。如果说 1953 年伊朗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那么卡沙尼的政治观念与实践也应被视为石油国有化运动的重要政治遗产。

（责任编辑：夏德美）

① 哈米代·达尼什朱、哈迪·瓦基里 《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中乌莱玛政治思想的起源》，《知识》（波斯语）2019 年第 6 期，第 64 页。

② 穆罕默德·萨梅伊 《伊朗的权力斗争》（波斯语），德黑兰内伊出版社，2022 年，第 392 页。

③ “教法学家监护”构想最早由霍梅尼在 1970 年出版的《伊斯兰政府》中提出，参见：Imam Khomeini, *Islamic Government: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 Hamid Algar trans., The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Imam Khomeini's Works, 2008.

④ 如巴列维国王的幕僚费雷敦·胡韦达（Fereidoun Hoveyda）认为：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理论基于其对伊朗传统（如《列王纪》）中“父为子纲”父子监护关系的理解，即教法学家（应当是）是（人民）的慈爱父亲，负责监护孩子，孩子需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这种见解有助于理解霍梅尼思想的左倾，也揭示了“教法学家监护”理论与“教法学家治国”实践间的差别。参见：Fereidoun Hoveyda, *The Shah and the Ayatollah: Iranian Mythology and Islamic Revolution*,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p. 41–46.

⑤ 美国档案显示卡沙尼在 1953 年 8 月授意其助手阿拉米什（Aramesh）收受了 10000 美元后，倒戈反对摩萨台。参见：Mark J. Gasiorowski, “The 1953 Coup D'état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9, No. 3, 1987, p. 274.